


# 蒋梦麟卷

马勇 黄令坦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蒋梦麟卷

马勇 黄令坦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梦麟卷/马勇, 黄令坦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300-22863-1

I. ①蒋… II. ①马…②黄… III. ①蒋梦麟-教育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9451 号

蒋梦麟卷

马勇 黄令坦 编

Jiang Menglin Ju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7.5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6 000		定 价 88.00 元

---

## 导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成熟的政治架构、思想文化基础，假如不是西方势力东来，中国极有可能在旧有的架构中长此终古。然而历史毕竟无法假设。“走出中世纪”的西方，很快搅动了世界，新发现、新技术迅速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古老的中国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潮”的冲击，中国的面貌也在渐渐改变。

明代中晚期开始传进的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与中国文明有异。成熟的或者说早熟的中国文明，其本质就是农业文明。而西方传进来的近代文明，其本质就是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而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怎样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引进、嫁接、生长出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新文明，最好又能与中国固有的农业文明水乳交融、融为一体。

“西潮”冲击下的中国，经过了不少惨痛、失败、绝望，但必须承认，只要回望一下过去的两百年，中国依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有了自己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也渐渐建设了自己的制度文明。

### 过渡时代学习经历

近代中国的进步是一代又一代人奋斗的结果，在这无数的先贤名单中，蒋梦麟的贡献很值得仔细研究。他的一生主要在两个领域工作，一个是长时期主持近代教育的重镇北京大学，是到目前为止任期最长的北大校长，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任部长，近代中国从传统的科举制度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建构起一套全面的现代教育架构、制度，蒋梦麟功不可没。

蒋梦麟一生工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农业复兴。农业破产，是伴随着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无法回避的遭遇。孙中山、罗振玉、黄炎培、梁漱溟，无数志士仁人都对中国农业复兴寄予无限期待，做出过无数努力，蒋梦麟也是这一长串名单中的佼佼者。他为中国的农业复兴贡献了自己的心智，后来台湾的复兴乃至“亚洲四小龙”的美誉，包含着蒋梦麟那一代人的贡献。

现代教育、农业复兴，是蒋梦麟毕生致力两个领域，他之所以有机会、有能力在这两个领域做出贡献，也是渊源有自，与其出身、经历、学养密切相关。

蒋梦麟生于1886年，因为他父亲在他出生的时候梦见了一只熊，以为吉兆，故原名“梦熊”，字兆贤，后因参加学潮更名为梦麟，有时又写作梦邻、孟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蒋梦麟的性格、为人，与其生存的环境、乡土文明也有相当关联，值得注意。他的家乡浙江余姚，那里因五口通商最早受到“西潮”影响。蒋梦麟的祖父早在道咸时期就在上海开了一个钱庄，积累了一些家产。不幸的是，他在盛年时伤了一条腿，后来严重到必须截肢的程度。而更不幸的是，蒋梦麟的祖父竟在这次截肢手术过程中因血液中毒而辞世，留下年仅12岁的儿子，即蒋梦麟的父亲蒋怀清。

怀清公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七千两银子，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遗产。只是怀清公年龄太小，无依无靠，只好将这些银子交给未来的岳父去打理。

蒋梦麟的母亲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且容貌美丽，能歌善吟，多才多艺。可惜，她在蒋梦麟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像传统中国社会一切有经济条件的家庭一样，蒋梦麟大约六岁的时候就被送到私塾读书，所读内容也都是传统士大夫早年必修的儒家经典，学习的基本方法就是死记硬背，学习的目标就是科举考试。期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光宗耀祖，这是传统士大夫出人头地的必由之路。

经过几年私塾教育，蒋梦麟的知识已有一些积累，年龄也渐渐大了。大约1897年的时候，怀清公将他送到刚刚开办的绍兴中西学堂学习。

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是蔡元培。蔡元培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影响蒋梦麟生命历程的重要人物。中西学堂课程设置像其名字一样中

西合璧，既有中国传统经学、文学、史学，也有英文、数学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这是晚清教育改革发生后的新气象，从而使蒋梦麟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外，也系统地接触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

1899年秋天，蒋梦麟的家乡因水患而发生了可怕的匪患，几百年来宁静的乡村由此而变得骚动不安。怀清公为躲避匪患携全家前往上海，蒋梦麟被安置在一家天主教学校继续学习英文。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蒋梦麟直接感受到了西方近代文明，使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内在缺陷。

蒋梦麟家乡的匪患，其实与中国北部的义和团运动有很重要的关联，是中国政治又到了一个多事之秋的象征。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因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强力镇压而向四方扩散，直隶首当其冲，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也不宁静，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沿海一带相当不安定。这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世界各国在那儿都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当清政府将向西方列强宣战的消息传出之后，不论中外，迅即陷入高度恐慌之中。为躲避战乱，怀清公连夜举家撤回故乡蒋村，不久又迁往余姚县城，蒋梦麟被安排在县城的一个中学里继续读书。

在余姚县城中学，蒋梦麟只待了一年左右，之后只身来到省会杭州。那时他大概已有出洋留学的想法，因而希望找一所比较好的教会学校继续学习英文。但蒋梦麟对杭州的情况实在不太了解，结果误打误撞进入了一所非常糟糕、落伍的教会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具有极端宗教狂热的传教士，他除了知道向学生强制灌输基督福音外，对西方文化如何传入中国，中国学生怎样才能掌握、理解西学，从来都不热心。

不久，在各地风起云涌的学潮感染下，这所学校的学生与学校当局发生激烈冲突，全体学生一致退学，自行筹办了一所学校，并请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命名为“改进学社”。这些学生的想法非常简单，他们渴望这所学校办得像牛津、剑桥一样出名。这当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到半年，学生的自治试验就宣告失败，蒋梦麟趁着这个机会进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继续学习。

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是一所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浙江省最高学府。蒋梦麟在那里不仅学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而且有机会接触到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各式各样的新思想。蒋梦麟的思想境界为之一变，并渐渐对一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未来前途也有了不一样的考

虑。他此时又觉得，出国留学并非首选，要想在中国出人头地，可能还得头悬梁、锥刺股，像历朝历代士大夫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然后踏入仕途，光宗耀祖。基于这样的判断，蒋梦麟在革命、改良如此高涨的气氛中，毅然坚定地复习科举考试的内容。

## 教育家养成史

1903年，十八岁的蒋梦麟返回家乡参加考试，如愿以偿考中了秀才。秀才只是科举考试的最初门槛，要想达到光宗耀祖的进士、状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蒋梦麟在中了秀才之后很快返回浙江省立高等学堂，继续在那里接受学堂教育。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处在急剧变革的时期，各种可能随时都在发生。当蒋梦麟中秀才的时候，中国知识人上升道路已在发生变化，科举考试不再是青年知识人的唯一选择。那时，不仅朝廷鼓励年轻人出洋留学，学习东西洋的新知识，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在那些年的发展，一批先富阶级也有力量将子女送往国外读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原本期待中进士、点翰林的蒋梦麟在1904年上半年几经犹豫做出了一个新的选择，那一年暑假，他只身来到上海，参加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期望在南洋公学为自己打好一个西方文化的基础，以便将来留学美国。

南洋公学是盛宣怀创办的洋务学堂，专门培养洋务人才。南洋公学预科按照美国中学学制设置、管理，其教学、分数等，也与美国的一些大学对接。因此可以说，考上了南洋公学，也就等于敲开了美国一些大学的大门。

在南洋公学，蒋梦麟待了两年。这两年，主要是英语的训练，为进入美国大学做准备。随后，蒋梦麟于1908年暑假回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遗憾地名落孙山。

落榜后的蒋梦麟并没有放弃留学的想法，毕竟他家在过去几十年有些积累。蒋梦麟向他父亲怀清公要了几千元钱，自费留学美国。当年9月，蒋梦麟抵达美国，但错过了当时入学的日子，只好请了一位学生帮助补习英语。第二年（1909）春，蒋梦麟获准进入加州大学农学院。

蒋梦麟之所以选择农学，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认为，中国既然以农立国，那么当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之后，中国更应该改进农业，让农业复兴，让乡土重建，让农民富裕。只有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现代化才

能得到落实，中国人才能真正获得温饱、尊严与幸福。另一方面，蒋梦麟的幼年毕竟是在乡村度过，耳濡目染，蒋梦麟对田野自然风光、适宜的乡村生活有着深情依恋，对农业技术改良有着浓厚兴趣。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实在的考虑，那就是蒋梦麟自幼身体羸弱，他想如果能常年在田野中接触新鲜空气，对他并不健壮的身体一定有莫大好处。

在农学院一个学期，蒋梦麟一直兴致勃勃，也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半年后的一个偶然机会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改变。一位朋友劝其改行，力主他学一门社会科学。这位朋友的第一个理由是，农学固然重要，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最需要的似乎并不是农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除非中国能够参酌西方国家近代发展的经验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否则中国的农业在中国政治转型完成之前，不可能单独凭借技术进步获得发展。这位朋友的第二个理由是，如果不改修社会科学，那么眼光必然狭隘，只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里，无法了解农业之外的重大问题。在这位朋友看来，中国农业式微并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社会的、政治的因素远远大于技术的问题。

20世纪初期，中国的留学生对外部世界有了自己的观察，他们普遍有了改造社会，甚至改造国民性的想法，因而那时的留学生不愿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方面下功夫，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确实不在少数，比如胡适、鲁迅、郭沫若等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朋友的建言不能不引起蒋梦麟的思考，并促使他下定决心，从1909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改学教育学。这是蒋梦麟求学生涯的一个大转折，由此也让他后来具有从事教育、复兴农村的双重理由。

1912年，蒋梦麟完成了在加州大学的学业，前往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师从杜威教授，继续哲学及教育学的研究。杜威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哲学家，他对现代中国教育及哲学发展影响极大，其主要的因素就是他招收到了蒋梦麟以及胡适、陶行知等几位后来极负盛名的中国学生。当然，杜威教授本身的学术成就是第一位的，也是这几位中国学生拜师学艺的前提。

追随杜威教授，蒋梦麟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苦读了五年，像他毕生最紧密的同学、朋友胡适一样，蒋梦麟也没有在西方哲学、西方教育方面选择研究方向。经过几年努力，胡适选择以西方哲学重解中国古代哲学为学术发展的基本路径，而蒋梦麟则以西方哲学、教育学理论重新解释中国古代教育，以《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为论题，于1917年6



月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一系列程序，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蒋梦麟在美国读书的这几年，正是中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本来是以大清帝国臣民的身份来到美国，可是现在大清王朝已成为历史陈迹。中华民国虽然经过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挫折，但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已成为中国人的唯一选择。在那几年中，蒋梦麟因机缘巧合认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指导下，他曾连续三年边读书边参加革命党《大同日报》的编辑、撰稿工作，用实际行动支持故国的进步发展。

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后，蒋梦麟马不停蹄、风雨兼程地回国，在家乡停留了短暂时光，就又如约赶往上海，接受黄炎培的聘任，在江苏教育会做事。江苏教育会是当时中国东南一个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机构，黄炎培自清末走来，为中国南部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他在几年前访美的时候，得到过蒋梦麟的帮助，因而对蒋梦麟的能力、为人格外欣赏，所以提前约请蒋梦麟学成归国后到江苏教育会服务。

结识黄炎培，是蒋梦麟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机缘。黄炎培与蔡元培是蒋梦麟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靠山。因为蔡元培，蒋梦麟后来成为北大最杰出的校长之一；此时因为黄炎培，蒋梦麟以江苏教育会的工作做兼差，同时进入商务印书馆，寻找了一个相对稳定且收入并不太菲薄的工作机会。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机构，成立于1897年，那时的主持人为极富学识的生意人张元济。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已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文化重镇，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最为畅销，引领了当时的思想潮流。

蒋梦麟因黄炎培的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也有借他的留学经历、教育背景，尤其是其人脉资源开拓一些新的事业。在商务印书馆，蒋梦麟受张元济的委托制订过西方名著的翻译计划，尽管这个计划后来并没有由蒋梦麟执行下去，但在一定意义上说，蒋梦麟的计划是后来的商务印书馆持续编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起点。

繁忙的编辑、组稿之余，蒋梦麟也给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撰写新教育的文章，并在大上海各种公开场合发表演讲，传播西方近代教育的新思想与新办法，推动中国新教育的萌生与发展。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不太合乎蒋梦麟的个性，同时因为江苏教育会的事务也牵扯了他许多的时间与精力，尤其是江苏教育会联合北京大

学等单位有意创办一份《新教育》月刊，需要蒋梦麟全身心地投入，于是不到一年时间，蒋梦麟就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主编《新教育》月刊之中。

《新教育》以“输入世界最近教育思潮、学术新知，传布国际大事”为宗旨；以“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为目标。创刊仅六个月，就发行到一万份，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蒋梦麟为《新教育》投入了全部精力，《新教育》影响的扩大也为蒋梦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在他主编《新教育》的第二年，就兼职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讲教育学及教育史。

蒋梦麟兼职北大教授，当然是因为他在《新教育》杂志的影响，另外两个直接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即他既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的得意门生，又与当时北大明星教授胡适不仅同为杜威的学生，而且交情甚笃，政治理念、教育主张也相当一致。更重要的是，蒋梦麟因为蔡元培，因为五四运动的机缘，成为北大不可或缺的一员。

陈独秀的《新青年》的出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了给新文化运动提供外来思想资源，那时许多新文化机构、学人，想方设法邀请世界知名学者来华访问并进行系列演讲，传播西方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梦麟的恩师杜威教授旋风一样地影响了中国。

杜威教授最初在日本一些大学讲学，1919年3月，蒋梦麟、胡适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遂与蔡元培、陶行知等人商量，邀请杜威来中国讲学。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专程赶往码头恭迎，并陪同杜威在上海、杭州等地观光、演讲，联系并与孙中山等政、学、商各界著名人物见面、座谈。按照原来的计划，杜威在上海、杭州、南京逗留一个星期左右，再到北京进行学术访问。不料当他们正在南方陶醉于山水园林的时候，在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而且改变了杜威的访华计划。至于蒋梦麟，更因五四运动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 “北大功狗”

五四运动发生之初，在上海的蒋梦麟虽然同情学生，支持蔡元培，但他并没有拿出很多的精力投身于这场运动，因为清末以来的学潮此伏彼起，让人无法在一件事上持久关注。直到6月，蒋梦麟在《新教育》

上发表了《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终于意识到了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政治未来的意义。蒋梦麟这篇文章对五四运动极为推崇，以为是中国思想文化“解放的起点”，并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抗争，这场运动终将“造成中国文运的复兴”。蒋梦麟的这个判断对后来的五四运动研究影响深远。

一场反帝爱国的学潮引发了政治上的大地震，持续两个月的学潮甚至开始向市民阶层、工人阶层中扩散。究其原因，除了政治活动家的活动、鼓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洁身自好的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愤而辞职，不告而别，造成了北京教育界的持续抗争。蔡元培能否复职，成为政府与学生运动主体之间能否妥协的一个标志，南、北学界想尽办法要让蔡元培尊严地、体面地重回北大。作为蔡元培的弟子，蒋梦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个运动。6月16日，蒋梦麟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举行的成立大会，支持学联要求政府敦请蔡元培回北大继续担任校长。

蔡元培5月9日辞职离开北大的时候，曾将校务委托给胡适等人。当北京乃至全国的学潮陷入僵持而无法收束的时候，要求蔡元培复职的呼声很高，以期以蔡元培复职换取学生重回校园复课。然而，有过决绝声明的蔡元培在面子上实在很难转圜，因为他明白政府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他回去，有意另觅听话的人。政府那些人的心迹也为北大方面所知悉，北大上下一致反对换掉蔡元培，另派新校长。处在夹缝中的胡适等人疲于应付，频频函电蔡元培，希望早日返校；并利用蒋梦麟与蔡元培特殊的师生关系，函请蒋梦麟务必劝驾。

对于胡适等人的请求，蒋梦麟自然照办。他专程前往杭州劝说蔡元培早日回北京复职，继续为北大掌舵。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蒋梦麟劝蔡元培回北大，而蔡元培却接受汤尔和的建议，在蔡元培回北大之前，先派蒋梦麟作为蔡元培个人代表回北大主持一切。汤尔和的意思很明白，蔡元培先前称病辞职，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了，现在政府让他回去他就回去，势必丧失威望。他建议蔡元培将故事演下去，不妨找蒋梦麟先行北上，稳定北大，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再定行止。

蔡元培之所以选择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除了汤尔和的推荐外，据说还有这样三点原因：第一，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同乡。第二，蒋梦麟与北大诸多新派教授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并一起合作《新教育》月刊。而《新教育》的方针是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时提出

来的。第三，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对蒋梦麟非常欣赏，这也似乎是蔡元培将北大校务委托给蒋梦麟的原因之一。蒋梦麟毕竟是留学美国的教育学博士，对学生心理素有研究，其学问修养足以服人。学生心安、老师服气，其余一切便迎刃而解。

7月21日，蒋梦麟由汤尔和等人陪同抵达北京；23日上午，北大学生集会欢迎蒋梦麟代表蔡元培到校主持校务；25日，教育部批准蔡元培的请求，同意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因蔡元培辞职而引起的风波至此总算平息。

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后，面对校内不安纷扰和官僚政客旧势力干预，他努力团结校内各方力量，很快使北大恢复如常。9月12日，蔡元培北上复职后，蒋梦麟继续留在北大协助蔡元培进行体制改革。在课程设置、管理方面，蒋梦麟援美国大学成例，采用选科制，准许学生就性之所近，于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促进学生个性充分发展。在学校内部组织系统方面，蒋梦麟经蔡元培同意，设立四大部：评议会，司立法，其委员由教授互选，校长任评议长；行政会议，司行政，其委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教务会议，司学术，其委员亦由教授互选；总务处，司事务，总务长及总务委员由校长委任，操全校事务之权。总之，蒋梦麟将他在美国所学教育学理论都尽量参照实际情形予以运用，这些改革对北大后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蔡元培精心主持和蒋梦麟积极协助下，北京大学像一叶小舟在风雨中艰难行进。但到了1926年，情况有变。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引退”，奉系军阀入主，北京的政治环境越来越险恶。4月，奉系首领张作霖捕杀了报人邵飘萍，蒋梦麟等一大批北大教授上了张作霖的黑名单。4月26日，蒋梦麟从友朋处获知这一消息，迅即在朋友的帮助下躲进六国饭店好几个月，然后再寻找机会逃离北京，脱离北大。他先在上海蛰居了半年，然后绕道赴杭州，参加革命事业去了。

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成立，蒋梦麟出任委员，并兼任省政府委员及教育厅厅长。1927年6月，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全国教育体制进行改组，设大学院，负责管理全国学术教育之行政事务。在各省区，废除教育厅，实行大学区制，以大学区校长总理区内一切学术、教育事项。

按照大学院部署，浙江设立第三中山大学，由蒋梦麟出任校长，负责主持浙江大学区。1928年初，反对大学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2月，

第三中山大学改称国立浙江大学，仍由蒋梦麟任校长。10月，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院长，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蒋梦麟继任，并同意将大学院改为教育部，于是蒋梦麟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任部长。

在浙江大学区任职期内，蒋梦麟对于推动各级学校一律使用白话文教科书的贡献极大；对于浙江大学的组建等也做了不少工作。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期间，主要贡献在于改进、理顺中国现代教育基本体制，明确了什么是大学，什么是中等专科，大学必须具备怎样的条件等基本问题，为中国现代教育此后很长时间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11月，蒋梦麟因中央大学易长、劳动大学停办等事，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发生冲突。吴稚晖大骂蒋梦麟不好好管理国家大事，整天过问谁是“野鸡大学”，谁可以招生，谁不可以招生等鸡毛蒜皮的小事，“无古大臣之风”。吴稚晖的批评让蒋梦麟深感不安，他在第二天便辞去了教育部部长的职务，以示负责。

蒋梦麟是“党国人才”，国民政府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当然不会让蒋梦麟无事可做。在他辞去教育部部长之后不久，国民政府任命他再作冯妇，重掌北大。1931年初，蒋梦麟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北京，此时改名为北平；重回北大，回到了他那些老朋友之中。

此时的北大，经过先前几年奉系军阀的蹂躏，以及稍后国民政府大学区试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北大，先是被奉系强制合并到“京师大学校”，后又被大学区实验合并至“中华大学”。北大师生为这两次合并进行了无数抗争，终因政治的力量太过强大而不得不屈从。政治上，北大已经屈节降格，经济上也没有获得好处。几年下来，北大经费枯竭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内部管理混乱，教授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在外面尽量多地兼课。人的精力终归有限，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北大教学质量在蒋梦麟重新接手时严重下降。可以说，蒋梦麟此次再掌北大，是北大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之一。

经费的枯竭，使蒋梦麟此次接手北大很没有信心，教授兼课过多，影响了本职工作；教授之所以过多地兼课，是因为学校没有办法开出合理的薪水，让教授安心教学，有尊严地生活。而对学校来说，也是有苦难言，经费中的十之七八用于教职工的薪水，尽管不多，而学校设备、仪器、书刊的添置，就显得微不足道。严重的恶性循环让教授失望，也让大学越来越难办。因此，蒋梦麟在得知政府的任命后，并不乐意接受。

对于蒋梦麟的这种顾虑，他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傅斯年、胡适等人心中相当清楚。傅斯年对于北大向来热心，于是找胡适商量，如何能筹到一笔款项来帮助蒋梦麟重整北大。经过他们二人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顾临详谈，决定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北京大学每年各出二十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用于设立研究讲座、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的费用。

中基会的援助计划使蒋梦麟信心大增，使他有可能放手进行整顿，在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相关人才。对于那些平庸的教授，蒋梦麟大胆辞退，他明白地告诉各学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这才是大学校长应有的魄力、担当与情怀。

有了中基会的经费支持，蒋梦麟就能聘到最好的教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北大教授队伍相当整齐，第一批聘请的研究教授有汪敬熙（心理学）、曾昭抡（化学）、冯祖荀（数学）、许骧（生物学）、丁文江（地质学）、李四光（地质学）、赵迺抃（经济学）、周作人（中国文学）、刘复（中国文学）、徐志摩（外国文学）、陈受颐（历史学）、汤用彤（哲学），稍后续聘梁实秋（外国文学）、叶公超（外国文学）、江泽涵（数学）、萨本栋（物理学）、饶毓泰（物理学）、朱物华（物理学）、张忠绂（政治学）、吴定良（统计学）、葛利普（地质学）、斯伯纳（数学）、奥斯谷（数学）等，皆一时之选。

在解决了北大的经费问题之后，蒋梦麟在胡适等人配合下，对北京大学的行政和教学制度做了很大变更，拟定了北大长期发展计划，明确“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基本方针，并以此方针改变了学校原来的一些制度，规定北大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

在学校的组织系统方面，蒋梦麟改文、法、理三科为文、法、理三个学院，实行学院制，全校共设14个学系。文学院先由蒋梦麟兼任院长，后聘胡适担任；法学院和理学院分别由周炳琳、刘树杞担任院长。改文学院之英文、法文、德文、东方文四系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四组，合称外国语文学系。

北大此次革新要点在于教师的挑选，蒋梦麟的基本想法是对教师只看学术上的贡献，以期将最理想的阵容摆在北大，从而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1930年以前，国内政治上并不稳定，教育经费积欠严重，教职员不能有尊严地生活，还谈什么研究、教学与创造。蒋梦麟接手后，一

方面争取外界财力支持，提高教授待遇，让教授安心教学、研究，不必再为生计而在校外辛苦兼课。另一方面，蒋梦麟依靠制度稳定教授，规定北大教授以专任为原则，在他校兼课者，则薪金较专任者少；在他校兼课较多者，则改任讲师；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两年，在聘约有效期内不得中途他去。

为了北大在内的国内外大学毕业生继续有条件地进行更为高深的研究，蒋梦麟改组北大研究院，分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各所主任由文学、理学、法学院院长分别兼任。规定北大研究院为北京大学在内的国内外大学毕业生继续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报考资格须国内外大学本科毕业者，如志愿研究并有专门著作，经审查合格者，虽未在国内外大学毕业也可报考，唯须经过规定之入学试验，合格者始得为研究生。入院考试的内容规定：一是所专习学科之基本知识，以至少能了解所治学科的基本知识及其沿革历史为及格，此项考试科目至少须在四种以上；二是外国语，以至少能用一种外国语读书、对译为及格。规定本校毕业生在校各学年成绩和外国语成绩平均在75分以上者，得免其入学考试。本校助教愿做研究生者，经本系系主任推荐，可免入学考试。研究生在读年限至少两年，至多五年，规定最初两年必须在院研究。

1932年10月，研究院正式招收了25名研究生，指导教授及研究课题有马裕藻的古声韵学，马衡的金石学，叶瀚的雕刻瓷器之研究，沈兼士的文字学，刘复的语音学、方言研究，朱希祖的明清史，陈垣的中国基督教史、元史、元典章之语体文及元代社会风俗研究，徐炳昶的中国古代哲学，钢和泰的宗教史、宗教美术，黄节的汉魏六朝诗，周作人的中国歌谣，钱玄同的音韵沿革、《说文》研究，沈尹默的唐诗研究，许之衡的词典研究等。这些教授均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这个阵容不仅为北大的中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不仅是北大百年历史上少有的阵容，也是中国当时最为整齐，个体及整体实力都最强的阵容。

当年蔡元培的工作重点是加强文科教育和研究，而蒋梦麟此时的重点则是加强理科的建设，他于1931年聘请李四光出任北大地质系系主任。在李四光的主持下，地质系的教学设备有了较大的改进，先后建立了矿物学实验室、古生物学实验室、矿物岩石光学实验室、岩石分析室、薄片制造室、天平室、绘图室、测量仪器储藏室，修建了地质学馆，开辟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还设立了地质学教室、古生物学教

室、选矿实习室等等。其他理科各系的发展也大体相向。据统计，到1935年，北大全校共有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件。这些虽说是大学教育所必需的设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北大能有这些设备确乎不愧为“全国各校之冠”的美名。

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蒋梦麟力所能及地加大投入，将图书部改称图书馆，另设图书委员会，研究决定有关图书馆的一些重大问题。为了扩大图书阅览设施，于1934年在嵩公府西院空地建筑新馆，有容纳500个座位的阅览室和供教授使用的24间研究室。书库有防火防潮的设备。图书馆藏书逐年有所增加，至1935年，北大图书馆共收藏中文图书170415册，日文书籍12275册，西文书籍67603册，中外文杂志400余种，中西文报纸30余种，并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孤本、珍本和善本。翌年还购进马隅卿收藏的小说、戏剧书籍5389册，其中多为罕见秘本。除学校图书馆外，北大文科研究所藏清朝内阁档案、汉简、拓片等为数尤多。

按照胡适的观察，蒋梦麟是很想把这个新的北大图书馆完全放在一种新的组织和新的效率上。简单地说，就是要“美国化”。因为他们深信，图书馆特别是大学图书馆，无论如何，美国的都是世界第一，这也是美国持续创新、不断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蒋梦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取得相当突出的科研成果。尤其是研究教授的规定大幅度地提高了研究教授的待遇，使他们不必为生存状况而操心，从而将主要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有效推动了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理科教授如李四光、丁文江的地质学研究，饶毓泰的物理学研究，王守竞的光学研究，曾昭抡的化学研究，汪敬熙的生物学研究，冯祖荀、江泽涵的数学研究等，都在国际或国内学术界处在领先地位。在人文科学方面，语音学方面设有语音乐律实验室，先是由刘复主持，1934年刘复去世后，改由罗常培负责，实验室有各种实验语音乐律的仪器55种，主要工作是计划调查全国方音，制成各声调曲线及图表。对中国古音韵和方言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和整理的工作，如刘复编辑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十韵汇编》，发表了《敦煌掇琐中辑》《中国文法讲话》《西汉时代的日晷》《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等；罗常培著有《厦门音系》《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音韵沿革》《国语字母演变史》《切韵探迹》《中原音韵声类考》《中国方音研究小史》等；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方言研究》等。1936年5月，由胡适、罗常培、顾颉



刚、周作人等发起组织歌谣研究会，得到吴世昌、朱光潜、沈从文、徐芳等人的积极赞助，先后编辑出版了《北大歌谣周刊》和《新国风丛书》等。在历史学方面，由孟森主持的明清史料整理室，购入清内阁大库所藏有关明清史的档案 60 余万件，自 1933 年起，开始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先后由马衡、胡适主持的考古室，藏有各种古器物 5000 余种，收购和交换的文献资料多达二万余件。考古室还和各学术团体联合组成西北考察团，在新疆一带发掘出汉简一万多件，后经陈受颐、蒙文通、傅斯年、孟森等人的整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起到相当大的推进作用。考古室的工作重点是整理所收藏的全部金石拓片，并编辑本所收藏的金石文字目录。从事这项工作的有郑天挺、姚士鳌、罗尔纲等人。陈受颐进行了总题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接触”的研究，钱穆也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讲义》《秦汉三国史》等著作。在哲学史方面，有汤用彤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史的研究，张颐关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等。在美学方面，有朱光潜的《谈美》《致青年的十二封信》《西方文艺批评史》等著述。在政治、经济、法律方面，比较有代表性和学术价值的著作有许德珩的《社会学概论》《社会学方法论》《家庭进化论》《唯物史观社会学》，张忠绶的《中国国际关系史》《近代远东外交史》《欧洲外交史》，赵迺抃的《英国制度经济学》《重农学派与重商主义之比较》等。

北大具有悠久的出版传统。从 1930 年起，又陆续恢复出版了各种刊物。由学校主办的除了《北京大学日刊》外，还有《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等。这些刊物基本上都能按时出版，刊载各教授专题研究论文，其他专刊如孟森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明元清系通纪》，张忠绶的《中华民国外交史》，陶希圣的《唐代经济史》，以及《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嘉庆三年太上皇帝起居注》《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等均先后出版。

傅斯年不幸去世后，蒋梦麟写有一篇《忆孟真》的悼念文章，深情回忆傅斯年对北大发展的贡献，提及傅斯年在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日的演说。傅斯年在那个演说中比较了北大几位校长的贡献、性格，以为蒋梦麟校长的学问不如蔡元培校长，但办事却比蔡校长高明；他自己（傅斯年）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校长，但办事也比胡校长高明。傅斯年说，蔡元培、胡适之两位校长的办事风格，真不敢恭维。傅斯年演讲结束时，蒋梦麟笑着说：孟真（傅斯年）说得对极了。所以，蔡校长、胡校